

生命历程视角下童年期迁移经历 与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研究^{*}

刘玉兰

【内容摘要】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利用 2010 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工厂权益保护的调查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期迁移经历对其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数据表明,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与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成年早期生命历程中的重大生活事件均有显著的差异,迁移类型、迁移时机和迁移持续期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命历程有持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来生命历程事件的发生模式以及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之中。整体看来,儿童随父母一起迁移对其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会有积极的影响,其中随父母一起长期迁移比长期的父母单独迁移对儿童未来的发展更好,这主要与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工家庭社会支持模式的变化有关。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迁移经历;生活机会;生命历程

【作者简介】刘玉兰,常州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江苏常州:213164。

Migration Experience in Childhood and Early Adulthood Life Chances: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Liu Yulan

Abstract: With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drawing on survey data fro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easant Laborers” in 201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migration experience in childhood and how it has affected their early adulthood life chanc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jor early adulthood life events between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ho had and had not migration experience. Childhood migration experience, migration timing, and migration duration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have lasting impact on their early adulthood life course, as reflected in later life course events and determination of personal income. This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and family social support patterns of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Migration Experience, Life Chances, Life Course

Author: Liu Yula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Ch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yulan@cczu.edu.cn

^{*} 本文受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理论和制度构建研究”(10JZD0033)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社会工作视野下流动儿童抗逆力提升模式研究”(11YJC840029)支持。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急剧转型, 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的机会和危险, 这影响了处于这种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个体生命, 其中, 个体生活机会的问题始终广受关注。市场、政治资本和社会关系究竟是如何决定个体的生活机会, 成为大量研究集中探讨的问题。农民工, 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下所诞生的独特群体, 其生活机会同样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很多学者都认为户籍制度在限制农民工生活机会方面扮演着主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困难, 比如: 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谢桂华 2012)、更差的精神健康状况(刘玉兰 2011)、更差的福利待遇和权益保障(郑秉文 2008)。

农民工生活机会的“户口决定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挑战(Shaohua Zhan 2011)。尽管已有研究仍然在究竟是户籍还是市场决定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机会方面争论不断, 但是社会学领域之外的研究实际上将农民工生活机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引向了市场—户籍之外, 认为其它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比如: 多重的身份角色(王小章 2009)。

本文并不打算在此路径下进一步讨论, 我们认为, 当大量研究集中于市场化转型和户籍制度改革过程时, 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变化也正在形成, 这对其生活机会的影响同样重要。本文关注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农民工生活机会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市场转型, 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成为“农民工”。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群体相继出现, 且规模不断增大。这类群体也正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巨大后备军, 人口迁移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 这种童年期的迁移经历(父母单独迁移或儿童随父母迁移) 势必会对这一代青年的发展造成影响。本研究试图指出, 在农民工的生活机会方面, 在人口大规模迁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童年期经历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是在现有的市场—户籍路径基础上的一种对话和补充。当大量的研究不断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细分, 不断指明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迁移意图的农民工是其生活机会存在内部差异的决定因素之后, 笔者试图补充指出, 童年期迁移经历对农民工的生活机会同样存在着显著差异, 且这种差异不应该被忽视。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生命事件(life events) 是生命历程理论关注的研究主题, 是指伴随着相对急剧的变化, 且会带来严重的、持久的影响的重大事件(Settersten and Mayer, 1997)。这些生命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和生命历程轨迹。童年期迁移经历作为儿童时期的生命事件, 对儿童未来发展的影响也是生命历程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在儿童成就的决定因素方面, 生命历程视角由于其能够提供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不同的研究路径, 而成为重要的解释模型之一。

2.1 迁移类型与生活机会

迁移是移民家庭儿童面临的主要风险, 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不仅是儿童时期, 也持续到未来的生命历程。学术界对迁移与儿童发展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是否迁移”这一变量, 虽然迁移经历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并没有统一的结论, 但目前的研究主要强调迁移对儿童发展的消极影响, 比如: 与一般学龄儿童相比, 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较差, 辍学等现象严重(周皓、巫锡炜 2008); 精神健康状况较差(刘玉兰 2012)。对童年期是否迁移在改变成年期生活机会的作用方面的探讨, 则集中在个人成年后的体验、家庭生命转型、教育路径、职业发展等方面。

在成年后的体验方面, 李晓敏等(2010) 研究发现童年期留守经历与儿童成年以后负性情绪和自尊的产生等有关; 梁宏(2011) 则提出第二代农民工在打工经历和主观感受等方面与童年期流动或

留守经历高度关联。在家庭生命转型方面,第二代移民也与没有迁移的大多数青少年表现出不一样的情景,如:西欧土耳其移民后代的生育行为就变得越来越适应于迁移国青年的生育行为(Nadja Milewski 2011)。在教育路径方面,第二代移民在不同的迁入国家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Heath et al., 2008);与大多数同辈群体相比,移民儿童更容易被学校开除,获得更低的教育水平(Crul and Vermeulen 2006)。在职业发展方面,很多移民面临着劳动力市场的歧视(Heath et al., 2008)和社会排斥(Shaohua Zhan 2011),这限制着其职业发展。在考察了迁移类型与儿童成年期发展的关系后,可以预想上述结论用以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也适用,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童年期迁移类型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与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相比,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机会较少。

2.2 迁移时机与生活机会

在迁移时机对儿童未来教育的作用方面,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期的迁移时机在个体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比如:有学者发现迁移对学业成就的消极影响在低年级的时候最大,随着年级的增长而逐年减轻(Ingersoll et al., 1989);也有学者认为,儿童期迁移对于高中学业完成的消极作用与事件发生时儿童的年龄大小有紧密联系,在青少年时期发生比儿童期的消极影响更大(Haveman et al., 1991)。

在婚姻家庭方面,那些经历了早期劳动力迁移的移民比非移民可能会推迟家庭的形成、结婚和生育(Parrado 2004);在健康状况方面,儿童早期的迁移是其焦虑情绪和压力的主要来源(Lewis et al., 1984)。我国对迁移时机的关注,主要是从农民工代际分化的角度展开的,认为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口特征、迁移动机、择业观念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邵岑、张翼 2012)。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迁移时机的不同对迁移者的发展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由此本文形成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童年期迁移时机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与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相比,童年期越早迁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机会越少。

2.3 迁移持续期与生活机会

在教育成就方面,有学者发现随着迁移频率的增加,终止学业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加,频繁的迁移与留级和问题行为有关系(Hammons, 1988),儿童期或者青少年期的迁移次数对高中教育的完成有负向影响,次数越多负向影响越大(Haveman et al., 1991)。对我国留守儿童而言,留守时间越长对儿童心理的不利影响越严重(郝振、崔丽娟 2007)。当然,不同的迁移持续期的影响也有差异,临时迁移儿童比本地儿童的入学率低,迁移低于一年的临时迁移儿童的入学率最低;永久迁移的儿童入学率最高(Zai Liang and Yiu Por Chen, 2005)。一般而言,迁移持续期越长对儿童发展的消极影响越大,这可能与家庭资源、家庭支持、家务劳动分配等有关。由此形成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童年期迁移持续期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与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相比,迁移持续期越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机会越少。

3 研究设计

3.1 概念操作化和指标体系

本文共有 4 个主要概念:生活机会、童年期迁移类型、童年期迁移时机、童年期迁移持续期。如表 1 所示,4 个概念是一级变量,它们形成了相应的二级变量。文中的变量关系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机会是因变量,主要包括初婚年龄、初育年龄、教育成就、初职工种和职业成就 5 个二级变量;自变量包括表示童年期迁移类型的有迁移经历和没有迁移经历变量;表示童年期迁移时机的迁移年龄变量;表示童年期迁移持续期的迁移年限变量。除了研究假设中提到的自变量外,本文还引入了一些可能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机会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包括人口学变量、人力资本变量、企业特征变量。

表1 童年期迁移经历与成年期生活机会变量解释列表

Table 1 Variables of Migration Experience in Childhood and Early Adulthood Life Chances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解 释
生活机会	初婚年龄	第一次结婚的年龄
	初育年龄	第一次生育的年龄
	教育成就	最终的学历水平
	初职工种	在城市第一次工作的工作类型
	职业成就	初职月工资水平、目前月工资水平
童年期迁移类型	没有迁移经历	童年期既没有流动经历也没有留守经历
	有迁移经历	童年期有流动经历或者留守经历
童年期迁移时机 ^①	迁移年龄	童年期开始流动或者留守的年龄:7岁、13岁
童年期迁移持续期 ^②	迁移年限	童年期流动或者留守经历持续的年限:0年、3年、6年、9年

注:①问卷中并没有关于迁移年龄方面的问题,仅询问“在小学和初中就读的学校类型”,所以只能根据此将迁移年龄转换为7岁、13岁两类。②问卷中并没有关于迁移年限方面的问题,仅询问“上小学之前、小学、初中和谁生活在一起”,所以只能根据此将迁移年限转换为0年、3年、6年、9年4类。

3.2 数据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刘林平教授主持的2009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和实践研究(09JZD0032)”的调查。该调查项目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外来工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对象被限定在“大专学历及以下跨县(区)流动到城市务工,且正式在企业或单位就业”的打工者,共抽取了4254户进行调查,其中,珠三角地区发放问卷2089份,回收有效问卷2046份,有效回收率为97.94%;长三角地区发放问卷2165份,回收有效问卷2106份,有效回收率为97.32%。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工,因此将“1980年1月以后出生,且持有农村户口或者是具有非农户口,但是属于农转非”作为筛选条件,选出新生代农民工个案2143个。由于本文重点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期迁移经历对成年期的影响,所以将研究对象做了进一步的分类和筛选。具体情况是: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划分为两种类型^①:第一种为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包括童年期有留守经历(父母单独迁移)和童年期有流动经历(儿童随父母一同迁移)两类^②,筛选条件分别是:小学和初中不在父母打工地的公立学校或民工子弟学校,且不和父母一起生活;小学和初中在父母打工地的民工学校或者本地学校上学。第二种为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既没有流动也没有留守)的新生代农民工,筛选条件为小学和初中在老家的学校上学,且和父母一起生活。本文最终分析的样本数为2099个,其中男性和女性各占50.0%;农村户口占91.8%,非农户口(属于农转非)占8.2%;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占38.8%,有迁移经历的占61.2%;平均年龄为23.5岁,标准差为3.5。

4 结果分析

4.1 不同迁移类型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状况

为了考察童年期迁移经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本文首先比较一下那些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和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生命历程事件的经历,这包括:(1)初婚年

① 在类型划分时,还存在另一种类型:这一类型不能确定是否有流动或留守,如:上学和初中就读的学校为舅舅家所在学校等。由于此种类型的个案数仅有44个,为了更清楚的展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将这一类型去掉。

② 虽然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应该将流动和留守视为一种变动的状况,而不是儿童固定的属性,由于此次调查项目中并没有此类问题的设计,所以本文仍然将流动和留守作为儿童固定的属性来考察。

龄 (2) 初育年龄 (3) 教育成就 (4) 初职工种 (5) 职业成就。

表 2 不同童年期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命历程事件比较表*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Tests for Group Differences in Experiences of Major Life Course Events

主要生命事件	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	童年期有迁移经历	显著性检验
初婚年龄(岁)			F = 16.106***
平均初婚年龄	22.3	23.2	
20~22	46.5%	35.8%	
23~25	40.6%	44.2%	
26~30	12.9%	20.0%	
个案数(个)	350	331	
初育年龄(岁)			F = 5.305*
平均初婚年龄	23.0	23.5	
20~22	41.0%	36.9%	
23~25	43.6%	37.8%	
26~30	15.4%	25.3%	
个案数(个)	300	241	
教育成就			$\chi^2 = 137.5^{***}$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9	11	
初中及以下	67.1%	41.3%	
高中、中专、技校	24.8%	42.1%	
大专及以上	8.1%	16.6%	
个案数(个)	836	1307	
初职工种			$\chi^2 = 22.7^{**}$
普工	57.6%	48.1%	
技工	25.0%	34.2%	
其他工种	17.4%	17.7%	
个案数(个)	827	1303	
职业成就			
初职月平均工资(元)	1295.8	1414.0	F = 10.675***
目前月平均工资(元)	1928.6	1927.3	F = 0.001

注: (1) 原假设为: 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事件与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事件没有显著差异; (2) * $p < 0.1$, ** $p < 0.01$, *** $p < 0.001$ 。

由表 2 可知, 两类新生代农民工在主要的生命历程事件上均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数据结果与研究假设一致。具体而言, 与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相比, 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初婚年龄较大 (23.2 岁 > 22.3 岁); 初育年龄也较大 (23.5 岁 > 23.0 岁); 教育成就较高 (11 年 > 9 年); 任职技工比例较高 (34.2% > 25.0%), 任职普工比例较低 (48.1% < 57.6%); 初职月平均工资较高 (1414.0 元 > 1295.8 元), 两类农民工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均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而目前月平均工资方面则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总之, 本文的证据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期迁移经历对这些个体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推迟了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 大约分别推迟了 1 年和半年; 获得了更高的教育成就, 大约提高了 2 年; 处于更好的劳动力市场位置, 也就是具有更高的技工比例, 且初职工资水平也高出 100 元左右。

4.2 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成年早期的工作成就作为生活机会的代表来集中考察童年期迁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具体的因变量是初职月平均工资水平的对数。首先,本文将纳入控制变量(人口学特征变量、企业特征变量、人力资本变量)、童年期迁移经历变量形成回归模型一,考察童年期迁移类型、迁移时机和迁移持续期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其次,为了进一步区别与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相比,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经历或者留守经历的影响,本文细化了迁移类型、迁移时机、迁移持续期3个变量并引入分析^①,形成回归模型二。

表3 童年期经历等变量对个人月收入对数作用的 OLS 模型^②

Table 3 Estimates from the OLS Regression of Personal Income on Selected Independent Variables for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b	S. E.	b	S. E.
截距	6.733***	0.051	6.737***	0.051
性别 ^a	0.118***	0.015	0.118***	0.015
工种 ^b : 技工	0.160***	0.017	0.160***	0.017
其他工种	0.101***	0.020	0.101***	0.020
单位性质 ^c : 个体户及其他	-0.088**	0.031	-0.087**	0.031
控制				
变量				
企业规模 ^d : 1000~3000人	0.073***	0.021	0.073***	0.021
3000人以上	0.088***	0.021	0.087***	0.021
教育年限	0.037***	0.004	0.035***	0.004
总的工龄	0.053***	0.006	0.053***	0.006
总的工龄的平方	-0.002***	0.000	-0.002***	0.000
是否党员 ^e	0.090**	0.036	0.085**	0.036
童年期迁				
移经历				
(一)				
迁移类型 ^f	-0.028*	0.018		
迁移时机 ^g : 7岁开始迁移	0.175*	0.097		
迁移持续期 ^h : 9年	-0.204*	0.097		
6年	-0.189*	0.107		
童年期迁				
移经历				
(二)				
迁移类型 ^f : 流动			-0.373***	0.105
迁移时机 ^g : 7岁开始流动			0.241*	0.119
迁移持续期 ^h : 留守9年			-0.103***	0.026
R ²	0.212		0.214	

注: ②由于篇幅限制,表3中仅列出自变量中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1) b为非标准回归系数,S. E. 为标准误。(2) * $p < 0.1$, ** $p < 0.01$, *** $p < 0.001$ 。(3) 参照组(取值为0): a为女性,b为普工,c为国有及集体企业,d为1000人以下,e为非党员,f为没有迁移经历,g为没有迁移经历,h为迁移年限为0年。

从表3可以看到,模型一的R²大约为0.212,说明童年期迁移经历变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1) 童年期迁移类型与生活机会。童年期迁移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收入的影响为负($b = -0.028$),表明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差于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假设1得到证实。模型二显示,这种负向影响来源于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期流动经历($p < 0.05$, $b =$

① 迁移类型细化为3类:没有迁移经历、有流动经历、有留守经历;迁移时机细化为5类:没有迁移经历、7岁开始流动、7岁开始留守、13岁开始流动、13岁开始留守;迁移持续期细化为7类:迁移年限为0年、留守年限为3年、6年、9年,流动年限为3年、6年、9年。

-0.121),表明童年期有流动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差于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

(2) 童年期迁移时机与生活机会。迁移时机变量中仅有 7 岁开始迁移的作用显著($p < 0.1$),回归系数为正($b = 0.175$),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7 岁开始迁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那些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时机中的其它变量的作用统计上不显著。假设 2 得到否认,表明童年期迁移时机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迁移时机越早影响越显著。模型二显示,特别是 7 岁开始流动的积极作用显著($p < 0.05$, $b = 0.021$)。

(3) 童年期迁移持续期与生活机会。童年期迁移持续期中迁移了 9 年和 6 年的作用显著($p < 0.1$),回归系数为负,分别为 $b = -0.204$ 、 -0.189 ,表明童年期迁移 9 年和 6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低于那些迁移年限为 0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假设 3 得到证实,说明童年期迁移持续期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有显著负向影响,迁移年限越长影响越负面。模型二显示,留守年限为 9 年的负向作用显著($p < 0.001$, $b = -0.041$),迁移持续期的负向影响来源于长期留守。

其它控制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首先,人口学变量方面,性别和工种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显著,其中性别变量显示出显著的男性优势($b = 0.118$);技工和其他工种相较于普通工人,收入也较高($b = 0.160$, $b = 0.101$);其次,企业特征变量方面,工作的单位性质中个体户及其他的比国有及集体企业的低,企业规模在 1000 ~ 3000 人和 3000 人以上的比 1000 人以下的工资收入要高;再次,人力资本变量方面,教育年限、工龄、党员身份对其收入的作用显著($p < 0.05$),其中教育年限和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为正,回归系数分别为 0.037、0.053;党员身份的作用的回归系数为正($b = 0.090$),表明具备党员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好于不是党员的。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基于 2010 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工厂权益保护的调查数据,研究表明与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命历程中的重大生活事件均有显著的差异,具体而言,推迟了初婚和初育年龄、获得了更高教育成就、处于更好的劳动力市场位置,初职月平均工资水平更高。与目前学术界主要关注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因素、户籍因素的研究不同,本文将分析视野拓展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考察童年期迁移类型、迁移时机和迁移持续期对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且研究结论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所发生的人口大规模的迁移,所带来的家庭地理位置或者家庭结构的变化,对这些人群的子女而言,除了会影响儿童时期的学习和生活以外,这种特殊的生命历程经历会造成持久的效应,影响或者改变这一代农村青年的生命历程。

就我国的经验来看,与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童年期迁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职业发展具有积极效应,较早的迁移影响越积极,迁移经历的消极效应只有在迁移达到一定的年限时才越明显(见模型一)。这说明,当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成为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时,整体看来,童年期的迁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有积极的影响,其中随父母一起长期迁移比长期的父母单独迁移对儿童的发展更好(见模型二)。早期移民的自我选择性理论、经典迁移理论和新迁移经济学,由于单纯强调迁移者的能力和家庭经济资源的作用,均不能给予合适的解释。就迁移而言,虽然其时常是一个家庭的经济策略,但是迁移过程能够破坏传统的家庭网络和进程,造成家庭持续的改变。迁移影响了家庭成员的生活,无论是那些一起迁出还是留在家里的成员,迁移对其家庭的形成、生活安排和职业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如表 2 所示)。这说明,在考察农民工子女发展问题的时候,隐藏在农民工家庭背后的非经济因素,特别是伴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工家庭社会支持模式的变迁应得到更多关注。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经历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

他们的生命历程嵌入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变迁效应缔造了特有的社会化过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社会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的虚空化过程推动着农民的外出,造成了农村的衰落过程(严海蓉,2005)。农村社会的解体,使得支持迁移家庭儿童发展的传统社会关系断裂。农村社会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目前更多地是以利益关系相互联系,原有的“守望相助”的支持模式成为稀缺品(王晓毅、马春华,2009)。人口的迁移造成农民工家庭社会支持模式的变化,农民工能够动用的家庭(农村老人)和乡土网络(亲戚、朋友、邻居)也日渐减少。家庭,特别是父母支持成为迁移家庭儿童发展依赖的主要力量。

本研究发现,比较而言,儿童随父母一起迁移对其发展的长期影响更加积极。对童年期有流动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流动造成其传统社会关系的断裂,家庭支持不能够补偿由于家庭迁移而带来的社区社会资本的减少,长时期的流动则使得儿童家庭支持能够重新稳固,同时,中国的迁移大多是依靠同乡网络完成的,这种同乡关系可以有效的弥补儿童迁移所带来的传统的支持关系的断裂,从而保证了流动儿童支持的连续性;对童年期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持续的留守则表示父母并不能够给予儿童足够的家庭支持,而农村社会的解体则使这些儿童的其它支持也不够。这和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Hagan et al.,1996),即家庭迁移的消极影响只有在父母不能给予儿童足够支持的家庭中发生,因为这样的家庭里面,家庭支持不能补偿由于家庭迁移而带来的社区社会资本的减少。

本文也存在一些遗憾。首先,数据受限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要考察童年期迁移经历的长期效应,理想的数据应该涉及到18~60岁的整个成人过程,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最大的到2012年只有32岁,因此童年期迁移经历的长期效应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其次,对迁移经历变量的考察动态性不够。目前有研究发现,儿童的流动或留守是一种不断变换的状态,静态的划分往往不能很好的展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个生命历程,所以期望能够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资料系统,从而更好的展示这一群体的整体生活。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谢桂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2012;4:103-124
Xie Guihua. 2012.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103-124.
- 2 刘玉兰.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与经济,2011;5:99-105
Liu Yulan. 2011. Factors Affecting Mental Health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5: 99-105.
- 3 郑秉文.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与挑战. 中国人口科学,2008;5:2-17
Zheng Bingwen. 2008.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Social Security for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over the 30-year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5: 2-17.
- 4 Shaohua, Zhan. 2011. What Determines Migrant Workers' Life Cha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ukou,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Market. *Modern China* 3: 243-285.
- 5 王小章. 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 社会学研究,2009;1:1-18
Wang Xiaozhang. 2009. From “Existence” to “Recognition”: Issues of Peasant Workers in the View of Citizenship. *Sociological Studies* 1: 1-18.
- 6 Settersten R. A., Mayer K. U. 1997. The Measurement of Age, Age Structuring and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233-261.
- 7 周皓,巫锡炜. 流动儿童的教育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人口研究,2008;4:22-33
Zhou Hao and Wu Xiwei. 2008. School Performance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Its Determinants: A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Analysis. *Population Research* 4: 22-33.

- 8 刘玉兰. 流动儿童精神健康状况分析. 人口学刊, 2012; 3: 78 - 86
Liu Yulan. 2012. An Analysis of Migrant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Population Journal 3: 78 - 86.
- 9 李晓敏, 袁婧, 高文斌, 罗静, 杜玉凤. 留守儿童成年以后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0; 1: 92 - 94
Li Xiaomin et al. 2010. Research on Negative Emotions, Behavior, Personal Relationship Caused by Left - behind Experience of Rural Children after Growing up.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 92 - 94.
- 10 梁宏.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 人口研究, 2011; 4: 17 - 29
Liang Hong. 2011. Migrating - out and Left - behind in the View of Life Cours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ond -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opulation Research 4: 17 - 29.
- 11 Nadja Milewski. 2011. Transition to a First Birth among Turkish Second - generation Migrants in Western Europe.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16: 178 - 189.
- 12 Anthony F. Heath., Catherine Rethon., Elina Kilpi. 2008.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Education, Un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4: 211 - 235.
- 13 Crul, M., H. Vermeulen., 2006. Immigration, Education, and the Turkish Second Generation in Five European N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C. A Parsons & T. M. Smeeding, Immi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6 - 250.
- 14 Gary M. Ingersoll, James P. Scamman and Wayne D. Eckerling, 1989. Geographic Mobility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in an Urban Setting.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 143 - 149.
- 15 Robert Haveman, Barbara Wolfe, James Spaulding. 1991. Childhood Events and Circumstances Influencing High School Completion. Demography 1: 133 - 157.
- 16 Parrado, E. A. 2004.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Men's Marriage in Western Mexico.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5: 51 - 71.
- 17 Lewis, C. E., Siegel, J. M., and Lewis, M. A. 1984. Feeling Bad: Exploring Sources of Distress among Pre - adolescent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4: 117 - 122.
- 18 邵岑, 张翼. “八零前”与“八零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行为比较研究. 青年研究, 2012; 4: 1 - 11
Shao Cen and Zhang Y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amily Migration in Floating Population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Before - 80's and Post - 80's. Youth Studies 4: 1 - 11.
- 19 Seltzer, Judith A. 1994. Consequences of Marital Dissolution for Children.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20: 235 - 266.
- 20 Hammons, R. A. 1988.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school Transfer and Dropout R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 21 郝振, 崔丽娟. 留守儿童界定标准探讨. 中国青年研究, 2007; 10: 40 - 44
Hao Zhen and Cui Lijuan. 2007. Research on Defining the Standards of Left - behind Children. China Youth Study 10: 40 - 44.
- 22 Zai Liang and Yiu Por Chen. 2005. The Educational Consequences of Migration for 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4: 1 - 20.
- 23 Albert Park, Leng Lee, Alan deBrauw. 2010. Parental Migration and Child Well - 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Some New Evidence from China. http://repository.upenn.edu/gansu_papers/24.
- 24 严海蓉. 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 读书, 2005; 7: 74 - 83
Yan Hairong. 2005. Depleted Countryside, Distressed Subjects. Readings 7: 74 - 83.
- 25 王晓毅, 马春华主编. 中国 12 村贫困调查(理论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2 - 40
Wang Xiaoyi and Ma Chunhua. 2009. Qualitative Poverty Assessment in Rural China (Theory Volume).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2 - 40.
- 26 John Hagan, Ross MacMillan and Blair Wheaton. 1996. New Kid in Tow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Life Course Effects of Family Migration on Childr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368 - 385.

(责任编辑: 石玲 收稿时间: 2012 - 10)